

試論新加坡華僑與辛亥革命的關係－以林文慶為例 夏其龍（2011/11/23-24）

新加坡是一個多元文化，多元民族的國家。它過去殖民時代的統治，曾是它繁榮興盛的原因。另一個更重要的原因是華僑的貢獻。十九世紀末的華僑中有很突出才能的“海峽僑生”。他們不單對本地的發展付出了一生，也對清末民初的中國投入時間、金錢及冒了生命危險。新加坡華僑對辛亥革命的貢獻便是這一代人的明証。其中林文慶是一個很典型而突出的例子。

新加坡的居民

新加坡（Singapore）的原居民是馬來人。1819年，英國不列顛東印度公司僱員萊佛士（Thomas S B Raffles）登陸新加坡，開始強行管轄此地。五年後，成為英國殖民地。1867年，新加坡聯同檳城（Penang）、馬六甲（Malacca）並列為英國海峽殖民地（Straits Settlements）。1942年至1945年太平洋戰爭時期，新加坡被日本佔領，曾改名為昭南。包括新加坡在內的馬來西亞聯邦（Malaysia）於1963年脫離英國統治。新加坡卻於兩年後，被解除與馬來西亞的關係，成為獨立主權國家。目前新加坡人口約五百萬，其中華人佔四分三，是中國大陸、香港、澳門、台灣以外，以華人為多數族群的地區。這些華人以福建人最多，其次為潮汕人、廣府人、客家人和海南人等。¹

新加坡移民

按新加坡通俗史作者皮爾遜（H F Pearson）的描述：“在這座新興的生氣蓬勃的新加坡城裡，大都有充分就業的機會，於是人們聞風而至，尋求職業。到1911年，人口已經上升到超過二十五萬，據說有四十八個民族，操五十四種語言。”²

新加坡華僑

新加坡、馬來西亞的豐富資源由英國管轄以後，於19世紀中葉吸引了大量中國人前往，使這區的華僑人口快速增加。新加坡的華僑人口在1810年代只有30人，1820年代驟增到三千多人，1830年代竟達一萬三千多人，超過島上其他任何民族。自1860年起，更佔總人口的六成以上。新加坡、馬來西亞的華僑，絕大多數是中國農村的貧農。他們成為礦場、工廠、種植園、碼頭船塢的工人和店員。其中有的積聚了一點錢後，成為小商小販，銷售工業用品和收購原料。經營成功的，便成為礦場主、種植園主、工廠廠主等，或成為代理商，或承包稅收而成為包稅人等等。³

按英國殖民政府的政策，在政治上扶持馬來的土侯、貴族，令華僑無從參政。但是富有的華僑商人仍然受到英國殖民地統治者的重視。其中一些人獲授甲必丹（capitan）之職⁴，或委以立法會議的非官方委員，陪審員，名譽推事，華人參事局（Chinese Advisory Board）委員，或封為太平局紳，授以勳章等等。另一方面，華僑富商大亨，也成清政府的賣官鬻爵、募捐籌款、吸引回國投資興辦實業等所要爭取的對象。清政府甚至委任一些著名的僑商為駐新加坡的總領事、領事。熱心於華僑社會福利公益事業的僑商大也有人在；如陳篤生之創建平

民醫院 (後稱陳篤生醫院)，陳金聲之出資興建自來水池，陳金聲與陳明水之創辦萃英書院，章芳琳之自組苑生消防隊等。⁵

華僑的結社

新加坡華僑的結社與乾隆期間反抗清朝統治的民間組織天地會有關，因為在歷次起事失敗逃亡海外的成員中，有部份人在新加坡等地定居，他們組成秘密會黨，成為最普遍、最有影響的組織。⁶ 根據學者對1876年海峽殖民地的描述，“海峽殖民地和各土邦的華人人口60%以上是秘密會黨的成員，其餘40%也都處在秘密會黨的影響之下。”⁷

當時，新加坡的義興會分廣府幫、福建幫、潮州幫、客幫和海南幫等五分支組織。這些組織的領導權基本上控制在商人手裡。除個別例外，都是鴉片稅承包者、煙館館主和經營甘蜜、大米、布匹等的商人。⁸

秘密會黨能在新加坡迅速蔓延，其中的原因是華工沒有獲得政府應給的保護，他們為了團結自衛，反抗強暴，便紛紛採用了天地會組織機構和結拜方式，加入秘密會黨。由於方言、地緣的關係，秘密會黨分成不同的幫會。各個方言地緣之間又存在著職業分工的傾向。秘密會黨受這些影響，也分成不同幫派，這些幫派之間由於長期形成的猜疑、誤解、敵視而常因一些細小事情，如喪葬、婚姻、礦區供水等而引起衝突以至械鬥。⁹

這些衝突，一方面削弱了會黨本身的力量，另一方面暴露了會黨組織，使英國殖民當局能夠採取對策，對會黨逐步控制。1890年《危險社團鎮壓法令》生效，所有秘密會黨被英國殖民當局宣佈為非法而加以取締、解散，著令公開銷毀秘密標誌、符號和神主。據當時的《叻報》報道，在1890年2月15日這一天，所有新加坡六大秘密會黨義興、義福、福興、廣福、松柏館和廣惠肇的首領和執事，都齊集於梧槽路 (Rochore Road) 義興會的總部，在正副華民護衛司和警察總監的監督下，舉行了莊嚴的儀式，焚毀了所有的神主標誌。然後，護衛司和警察總監上前祝賀他們重新成為良好的公民。¹⁰ 但是，華僑秘密會黨並沒有就此停止活動。“查禁危險會黨的結果之一，是有很多小的兄弟會黨出現，它們不斷地消失，又以不同名目重新組合”。¹¹

公開的組織

華僑的社會組織，除秘密會黨之外，還有地緣、血緣和業緣的組織。地緣組織多稱為會館，也有的稱為同鄉會。如福建會館、廣東會館、潮州八邑會館、瓊州會館、永春會館、寧陽會館、應和會館、三江會館等。這些地緣組織傾向於與另一個語言接近的地緣組織聯合。這種聯合趨向，最終形成了福建、廣府、潮州、客家、海南、三江六個大幫。

血緣組織一般稱為“館”、“堂”或“總會”等，也有一些稱為“宗祠”。最早華僑血緣組織為新加坡的曹家館，1819年創立。由於華僑所從事的行業幾乎無所不包，所以業緣組織不可勝數。各個主要的行業如木工、建築、打鐵、製革、製鞋、裁縫以至甘蜜、胡椒、碩莪、黃梨等加工和貿易等，都有各自的行業組織。

這些組織的領導權都掌握在華商手裡。雖然各種組織採取選舉方式產生爐主、總理或主席等，但是要成為這些組織的領導層需要有自己的房屋或商店以安放香爐、進行祭拜祖先或開山祖師，並能帶頭捐出較大款項作舉行各種儀式之用，這在實際上已把基層華僑排除在各種會館的領導層之外。秘密會黨遭到英國殖民當局鎮壓成為非法以後，地緣、血緣、業緣組織獲得了更大的發展，成為華僑社會最普遍最廣泛的組織。¹²

清政府鑑於這些組織的影響力，委派商務大臣張振勳來新加坡勸辦商會。各籍華商於光緒三十二年（1906年）成立了一個超地域、幫派的新加坡中華商務總會。總會組織成員，任期一年；福建幫得總理一名，協理四名，議員十六名，潮幫得總理一名，協理三名，議員十二名；廣幫、嘉幫與瓊幫，每幫各得協理一名，議員四名。¹³

海峽僑生

在19世紀的海峽殖民地，中國出生的大批華僑面對著另一種華僑群體，叫“海峽僑生”或“海峽華人”，也叫“峇峇”（baba）¹⁴。他們是在海峽殖民地土生土長的華僑。最初峇峇是指華僑與當地婦女通婚後所生的後代，滿刺加時期我國古籍中所記載的“間有白者，唐人種也”，指的就是這些華僑和當地婦女通婚後所繁衍的後代。由於明清封建統治者採取的禁止人民移居國外、特別是禁止婦女出國的政策，使得在國外謀生的華僑只得同當地的婦女結婚，生息繁衍，這樣，就逐漸形成了一個土生的華僑群體。

隨著大量華人移民的進入，海峽僑生的數量也相對地迅速增加。19世紀的海峽僑生，在從事經濟、貿易活動中，有著許多有利條件。首先，他們自小生長在殖民地，既懂得馬來語，熟悉當地的風俗習慣，又長期接觸西方文化，熟悉殖民地情況，有的還懂得英語，可以直接與馬來人、歐人打交道，在從事經濟活動時，比華僑有利得多。其次，海峽僑生自祖、父輩便居住在海峽殖民地，其中有部分人的祖、父輩為他們積累了一定的資本，要從事商業貿易，投資礦業、種植業，都有一定的經濟基礎。最後，殖民地的經濟操縱在歐人特別是英國資本家手裡，各大進出口商行和金融機構都為他們所掌有。海峽僑生由於祖、父輩已定居在殖民地，在當地有一定的產業，他們是歐人資本家認為較合適的代理商與中間商人選。

凡此種種，使得海峽僑生在19世紀華僑的經濟活動中，起著重要的作用，不少海峽僑生因此致富成了著名的僑商。在19世紀新加坡華僑社會15位著名的僑商和僑領中，蔡淹浪、陳篤生、陳金聲、章芳琳、陳明水、陳金鐘、顏永成、余達城、陳若錦、林文慶、宋旺相等11人是海峽僑生。

這些海峽僑生大多保留著中國人的文化、風俗習慣、語言。披長袍，穿布鞋絲襪，戴布帽，留辮子。社會禮儀、婚姻喪葬、祭拜祖先，完全依據中國的傳統方式。他們接受英文教育的只是把它作為多一種謀生手段。¹⁵所以他們大多數都渴望祖國富強，也踴躍捐款賑濟受災同胞。僅1887年在新加坡一地，僑生陳明水等即為山東受災難民籌得28萬元。他們也支持國內的變法維新運動，並在新加坡、馬來西亞掀起一個革新運動。維新變法運動失敗以後，不少僑生又支持

孫中山領導的辛亥革命運動，僑生陳楚楠、張永福、林義順等甚至成為新加坡、馬來西亞華僑支援辛亥革命運動的領導人。由於海峽僑生希望有一個獨立繁榮富強的祖國保護他們，所以1901年醇親王載灃經過新加坡時，海峽僑生代表林文慶、宋旺相、阮添等等即向醇親王親致頌詞，一再申明“中國乃民等祖宗父母之邦，民等時深忠愛，不敢或忘。亦深望朝廷不忘海外華民，因等祖宗父母，俱係中國之民，前來海外謀生，所有教化、風俗、正朔，咸遵中朝制度……雖英籍，而水源木本，譜種來自中華，則此心自無敢或忘中國”，反復強調“民等蒿目中國時局，不勝懸念，深望中國日進富強……深望王爺返節之後，輔助皇上維新，以中國古聖王之政治為基，而更善以泰西之良法善政，俾與天下諸國並駕齊驅，是則生長海外眾華民之所望也”。字字句句充滿著僑生們對祖國、對民族的無比熱愛和殷切期望。¹⁶

華僑支持中國革命

海外華僑是辛亥革命這場革命的強有力的支持者。新加坡更是華僑醞釀革命的策源地之一。¹⁷ 當地華僑曾經強烈地要求清政府能設置領事保護他們，可是清政府在新加坡、檳榔嶼設置領事以後，並沒有能改變他們受剝削、受奴役的地位。華僑中的資本家曾經積極投資國內，興辦實業，但卻碰到重重阻力和障礙而失敗。當中國日益陷於被瓜分、被滅亡的危險時，新加坡、馬來西亞的華僑看清清政府的虛弱，便積極地支持和參加孫中山先生領導的辛亥革命。華僑中的工農群眾有濃厚的民族意識，成了支持辛亥革命運動的中堅力量。華僑中的小工商業者也積極擁護革命和參加。他們有的是被販賣到當地的“豬仔”，僑居國外，接受西方思想，其政治覺悟較高。因此，他們在辛亥革命中表現特別激進，如張永福、陳楚楠、林受之、林義順、黃乃裳、許雪秋、陳文褒等，他們積極支持和參加辛亥革命，不僅捐助了大量的款項，而且許多人還親自回國參加孫中山發動和領導的各次武裝起義，有的還獻出了生命。反而，華僑中的大資本家，有的與英國殖民當局、有的與清朝封建統治階級有著密切的聯系，因此，除了個別例外，一般都不支持或反對辛亥革命。¹⁸

維新派及革命派

但是，新馬僑生在參與革命派之前，維新派已率先抵達新加坡。中日甲午戰爭失敗後，國內變法圖強的呼聲日益升高。知識分子上書請朝廷變法改革，光緒皇帝深受感動，重用康有為展開了戊戌變法，國家也有了一番新氣象。但維新僅百日後便抵不過頑固的守舊勢力：光緒帝被軟禁，慈禧太后重新垂簾聽政，新政遭廢除，全部與變法有關的人士或被捕下獄，或遭到殺害。而康有為與梁啟超則順利逃亡，在海外製造輿論營救皇帝，成立保皇會，拉攏華人反對慈禧太后，並宣傳君主立憲。¹⁹

當時孫中山的革命運動也早已在中國展開，不過在海外的華人社會中，保皇維新思想由於傳播得較早，所以支持維新派的人較多。康氏於光緒二十六年(1900)抵達新加坡，成立保皇分會，由於他以光緒皇帝導師及維新運動的領導人物之身分，到處演講、遊說，因此所到之處受到熱烈歡迎，並得到許多華民的附和。溫和的改良派，將愛國與愛皇帝結合起來，以忠君愛國為主旨，並改良朝政，以救中國。另外一支激進革命派，包括孫中山卻主張激進的革命運動，以“推翻滿清，驅除草莽，恢復中華”的民族主義思想口號為綱領。²⁰

孫中山的革命

孫中山因為在中國受到清廷的嚴密追緝，所以革命運動先從海外開始。首先，孫中山的日本友人宮崎寅藏1900年往新加坡意欲游說逃亡中的康有為與孫中山合作。可是，卻遭誣陷而被英國殖民當局逮捕下獄。孫中山親赴營救，幾經周折，才救出宮崎寅藏，但他卻被英國殖民當局驅逐出境。英國殖民當局規定孫中山在五年內不得進入海峽殖民地。他在新加坡停留的時間雖然只有幾天，但結識了一些華僑的重要人物。一是林文慶，一是黃乃裳²¹。林文慶是孫中山在英國時結識的朋友，營救宮崎寅藏，在很大程度上靠他的斡旋、努力。他與孫中山的接觸，使他開始從維新派轉向革命派。黃乃裳原是維新變法的積極擁護者，在北京時曾經八次上書，提出各種維新的建議。戊戌政變後，於1899年逃亡到新加坡，任《星報》主筆。他與孫中山的多次往來接觸中，感到孫中山為人“謙衝鎮靜，學問淵博”，與孫中山“志同道合，相與訂交”，“堅定中山數言為主義”²²，從此積極擁護孫中山領導的推翻帝制、建立民國的革命運動，成為華僑中的一位堅定的革命派。

繼孫中山後，革命思想在新加坡的傳播只好全靠革命黨員尤列的奔走。尤列於光緒二十七年(1901)來到新加坡，但礙於當時維新派的勢力很盛，以行醫為名，深入下層工農群眾，向農、工二界及義興會員發揮反清復明之宗旨，宣傳革命排滿。半年後，在新加坡設立中和堂。²³中和堂的會員後來很多加入了同盟會，成為同盟會分會的主要基礎之一。²⁴

除了有下層民眾的響應之外，另外也有少數知識分子參與其內，其中最著名的是原本支持維新保皇派的新加坡商人張永福與陳楚楠。²⁵孫中山被限制到新加坡的禁令解除後，於1906年兩度來新加坡各地成立了新加坡、吉隆坡、檳榔嶼三個地方的同盟會。新加坡的同盟會，因為有尤列、陳楚楠及張永福等人的積極宣傳與聯絡，所以是最早成立的，也兼負起策劃與帶領南洋各地的革命組織。新加坡同盟分會成立之後，在1907年創辦了《中興日報》，投入對保皇派的《南洋總匯報》的論戰。辛亥武昌起義爆發前，新加坡、馬來西亞各地的書報社有百數處，較著名的有新加坡的“星洲書報社”、“同德書報社”、“開明演說書報社”等。各書報社均設有各種革命書籍和革命報刊以供華僑群眾閱讀，又是革命派發表演說、進行宣傳鼓動的場所，有的書報社就是同盟分會的會所。創立“星洲書報社”的華僑牧師鄭聘廷，以及華僑基督教徒李鏡仁、盧禮朋等，也成為同盟會的會員。²⁶

兩派競爭

維新派與革命派一開始都很積極的拉攏富商。但華商選擇加入維新派的陣營，因為一般大眾以擁護清廷及忠君的傳統思想自居，亦恐怕連累家鄉的家人。革命黨員只能退而尋求中、下層人士的支持。兩派在言論思想方面的較量也很明顯，頻頻於報刊上作筆戰。維新派與革命派皆認為發展學校教育是有效的辦法，因為它的作用可以影響整個社會，又可提供工作機會給具有教師資格的維新與革命派人士。更重要的是提供了從事政治活動最佳的掩護。

許多海外華人社區的新式學校多為維新保皇派人士所主持，康有為還曾協助創辦新加坡的中華女子學堂。此外，許多華人創辦的學校也容易由維新派所控制，因為這些創辦人大多本身就是清政府及維新派的擁護者，所以創辦者較喜

歡接近維新派。革命派因此轉移目標往創辦夜校，講授現代性的知識，發展新、馬的郊區或小城市的日校。在影響學生思想方面的辦法，是由各革命性書報社、公開演講與劇團的相互配合。

兩派思想的論戰持續了好幾年。維新派的《南洋總匯新報》作為維新派宣揚的喉舌後，即經常攻擊革命派的種種活動與革命思想。革命派也不甘示弱，在《中興日報》與對方的報紙打起思想論戰。兩派的活動與思想論戰，給予華人社會不少衝擊，也拉近了華社與中國的關係。²⁷

清政府壓制

清政府對海外華僑的反清力量也沒有漠視。它命令公使、領事偵查、監視和壓制各種反清活動，想盡辦法要將康有為與孫中山逮捕，甚至出高額賞金要他們的性命。由於革命運動已逐漸由地下組織轉變為明目張膽的進行，其中由張永福與陳楚南創辦的《圖南日報》更常常刊載各地的反滿言論，所以常遭到支持清政府的華商和維新派的攻擊，甚至圖謀以經濟手段來打擊他們的商業活動，以期使他們的報社無法繼續經營下去。另外，孫中山與革命同志在南洋各島售賣軍務票之內容，孫士鼎總領事也詳細調查後回稟粵督，並設法禁止。可見駐新領事與中國各屬單位的聯絡毫不鬆懈，意期能完全杜絕革命黨的起義活動。領事對於新馬華人也時常告誡，勿參與及資助革命黨人的活動，否則將予以嚴懲。華文報上也常報導一些革命黨人被逮捕後正法的消息，以警惕海外華人。駐新領事為了更有效的查緝革命黨人，還利用新加坡殖民政府來壓迫革命黨人。宣統二年(1910)，孫中山在檳城召開會議，出席者包括他多年來忠實的信徒，及馬來亞各分會的代表。而另一項任務則準備在新馬進行籌款運動，但他為籌款的演說觸及了英國在新馬的殖民政策。於是他突然接到英方殖民官的下令驅逐離境。殖民政府原本對於中國的改革者，多抱以同情的態度，但是對於革命黨似乎較採敵對態度。英方認為革命黨是屬激進改革派，相較於維新派的溫和改革，更容易引起僑社的動亂，也不希望革命黨利用新馬作為革命事業的基地，且基於中英雙方的利益，也不願因縱容革命派而使中英關係惡化。為嚴防革命黨及各會匪私運軍火進入中國，總稅務司赫德(Hart)也訂定章程，並頒發於各口岸稅務司奉行，以嚴防之。²⁸

辛亥革命

新加坡、馬來西亞的華僑在辛亥革命中，有的成為武裝起義的領導人和骨幹，如發動1907年黃岡起義的許雪秋、黃乃裳、陳芸生等，發動惠州七女湖起義的鄧子瑜等；有的成為國內同盟會地方分會的負責人，如廈門同盟會的主要負責人之一施銘等。

1911年初革命黨人準備在廣州發動起義，由黃興組織“選鋒隊”(即敢死隊)。華僑紛紛報名參加，僅從新加坡和檳榔嶼等地回國準備參加這次起義的華僑革命志士即不下500人。在“三二九”黃花崗起義殉難的烈士中，其中新加坡、馬來西亞的華僑16人。²⁹新加坡、馬來西亞華僑革命志士，還參與了革命黨人暗殺清朝達官貴族的行動。其中突出的有溫生財之刺殺清將軍孚琦和陳敬岳之刺殺水軍提督李准。

新加坡、馬來西亞華僑經濟上對辛亥革命的支持，是多方面的，既有籌集武裝起義的經費，又有革命黨人的活動費用，進行革命宣傳的費用等等，募集款項的渠道繁多，經手人分散不一，很多捐款是通過其他名義募集的，有的又是秘

密進行的，有人曾對新加坡、馬來西亞華僑支持國內各次武裝起義的款項作過約略估計：支持1907年兩次潮州起義（包括黃岡之役和未遂的汕尾起事）約5萬元，支持欽之廉之役、鎮南關之役和河口之役5700元，支持黃花崗起義約4.7萬多元，支持武昌起義約87萬多元。其中兩次潮州起義的經費全新加坡華僑所擔負。自1906年以，新加坡、馬來西亞便成為東南亞地區華僑支援中國革命的中心。

孫中山等革命黨領袖對新加坡、馬來西亞的地位也十分重視。他們經常到新加坡、馬來西亞來親自做華僑的宣傳發動工作。革命黨最主要的負責人黃興、胡漢民、汪精衛、居正、田桐等，都曾到過新加坡、檳城嶼、怡保、芙蓉、吉隆坡等地活動。孫中山本人到新加坡、馬來西亞活動達九次之多，有時一次達八個月之久。³⁰

新加坡、馬來西亞的華僑大力支援祖國辛亥革命的同時，華僑社會的發展產生了巨大的影響。在支援辛亥革命的鬥爭中，革命派的各種組織，如中和堂、同盟會各個分會、閱書報社、學校、劇團等，都有各個方言的華僑參加。通過反覆的接觸，開始打破幫派界限，促進了華僑的聯合和團結，這是辛亥革命對新加坡、馬來西亞華僑社會的一個重要影響。³¹

新加坡華僑很明顯地與辛亥革命有密切的關係。其中最能表達新加坡華僑與辛亥革命的淵源及漸變關係的，應是海峽僑生林文慶。

林文慶(1869-1957)³²

林文慶生長在海峽華人的家庭裡，祖母是檳榔嶼娘惹，母親是馬六甲娘惹。因為父母早喪，他由祖父林瑪彭撫養長大。祖父認識中華文化的，影響林文慶日後對中國的文化根源的追尋。

林文慶是第一批獲得女皇獎學金³³留學英國的海峽僑生。赴英求學六年的經驗、英帝國的輝煌成就、改革和科學的思想、女權新思想新觀念等，使林文慶脫胎換骨。他反思自己的"漢族"身份，發奮學習中文，同時從英文作品中了解中華文化，特別是儒家思想，也開始關心中國受外強欺負和國人試圖改革自救的努力。1893年，林文慶從英國回到新加坡。他對社會的貢獻受殖民地政府欣賞和大部份華人社會的欽佩。與此同時，他積極回應中國的改革事業，對維新的成敗極為關注。林文慶在1895年發表兩次演說，談華人的教育及中國的革新，顯示出改良主義的思想。³⁴

他對中華文化的研究造詣極深，先後著譯了《孔教精神》、《用孔教眼光看第一次世界大戰》、《東方生活之悲劇》、《中國國內之危機》、《新的中國》、《李鴻章傳》、《離騷英譯》等，大力宣傳中華文化，儒家精神，關心著祖國的命運。他不但支持康有為的變維新運動，而且努力推動華僑的革新運動，提倡辦學校，辦女子教育，倡建戒煙所、女子天足會、孔教會、國語會、音樂會等，後來他參加同盟會，積極支持孫中山先生領導的辛亥革命，應陳嘉庚先生的邀請出任廈門大學校長十六年。他眷戀祖國，弘揚中華文化不遺餘力，對僑生社會和整個華僑社會民族意識的加強做出了貢獻。³⁵

林文慶與康有為

林文慶的中國政治活動起源於與康有為的接觸。中國在甲午戰爭中敗給日本，刺激國內改良主義思想的發展，在康有為的領導下揭開了百日維新的序幕。新加坡的第二代移民邱寂園在當地創辦《天南新報》，響應康有為的維新運動，

林文慶受邀擔任英文總校。百日維新前夕，《新加坡自由報》報導(中國的改革)("Reform in China")中提到康有為及其改革活動已受到重視，還強調這對於林文慶及其同志來說是一種鼓舞。在百日維新進行期間，新加坡領事館表示為華人子弟推展新式教育，展示對光緒皇帝興辦教育的支持。林文慶便以海外僑生辦學作為參與中國維新的一次實際行動。³⁶

百日維新失敗後，維新重要分子遇害，康有為和梁啟超逃亡海外、光緒皇帝被監禁、慈禧太后有意另立新皇帝、義和團亂局和八國聯軍入侵。林文慶深感驚訝與痛心，於是用筆名"WenChing"、"Historicus"、"One of The時"在《海峽華人雜誌》上寫下哀悼的詩歌和議論當時事件或人物的文章。³⁷

林文慶的保皇活動

戊戌政變後，在邱寂園和林文慶的推動下，新加坡華商於1899年10月11日致電北京總理衙門代奏，恭請皇帝聖安、要求太后還政。在500多人聯名的電文中，林文慶的姓名位列第三。他領導的"好學會"，約300多人率先題名。1900年，維新派領袖康有為逃亡新加坡。林文慶和邱寂園負起接待和保護的義務，協助康有為得以匿藏此地半年之久。其間曾住進林文慶家中十天。林文慶親自要求總督瑞天咸(Swettenham)不向外界透露康有為的行踪。當清廷追殺得緊時，林文慶獲總督協助，讓康有為登船假裝遠赴歐洲，實際上是半途回返新加坡。在林邱的掩護下，康有為以新加坡為基地，在幕後指揮各地保皇會的活動。

1900年6月，中國義和團動亂導致八國聯軍入侵。康有為認為這是一個聯合外人拯救皇帝的良機，於是一面籌劃漢口自立軍起義，一面爭取各國政府的支持。康有為想要拉攏外國人，在寫給邱寂園的信中屬意林文慶作中間人。1900年8月，自立軍起義失敗，滿清政府追捕反清者。義和團與八國聯軍，跟著亂局，使林文慶寫下一系列評論文章，後來經過修訂編輯成書，即是《中國內部危機》。

林文慶的心態

林文慶對中國文化產生了極強的認同感的時候，中國正經歷了一個大變革時代。他由西方轉入東方之際，恰恰是中國由東方思維轉入西方的時候。³⁸

他於1896年成立"華人好學會"(Chinese Philomathic Society)進行海峽華人改革運動。一年後創辦《海峽華人雜誌》(Strait Chinese Magazine)。最吸引林文慶的是康有為在改革時不忘儒家。康有為利用儒教以達成民族改革的事業的觀點，是非常適合林文慶的口味。林文慶全力發揮他的文化使命感，成為尊孔運動的靈魂人物。1902年新加坡成立孔教會以後，林文慶一直都是重要的領導人。他極為擔心西方和馬來文化影響華人文化的發展。因為中國移民娶馬來土婦為妻，會將所生之子送往學西語。他認為本地華人需要一種共同的語言，他於1899年組織了華語學習班，在自己家裡上課。後來學員增加，就借用威基利俱樂部(Weekly Entertainment Club)上課。

林文慶擔心海峽華人和馬來婦女通婚對子孫產生不利的影響，華巫混血的馬來化趨勢會使華人變質。林文慶自稱在1894年便開始到處演講宣傳孔子。他曾說：回教徒讀可蘭經，基督教人士傳授聖經，只有海峽華人的子弟是在沒有道德訓練下成長的。

林文慶在新加坡有很多志同道合的朋友。對康有為思想亦步亦趨的邱寂園更是他從事維新工作的戰友。二人緊密配合，包括創建華校，合辦《天南新報》，他們還投入實際的中國政治，加入新加坡的保皇工作。

1901年醇親王來訪，林文慶與朋友奉獻頌詞，以一個中國子民的口吻，表明不忘祖國，也不希望祖國忘了他們。兩年後，他還陪同肅親王的兒子到北京，回來的時候，寫了一篇名為《峇峇在中國開發事業上的任務》。當時林文慶所不敢違背的是儒家所提倡的忠於國家的法則。

康有為從中學伸向西學，而林文慶則以峇峇、英文教育者和英國子民的身份，從西學轉向中學。民族意識和祖先文化的追認，使林文慶關心動盪不安的中國政治。林文慶1893年從英國返新的30年內，中國發生甲午戰爭、百日維新、戊戌政變、義和團排外、清廷立憲、辛亥革命、袁世凱竊政、中國參加世界大戰等事件。林文慶一生先後接觸了爭取華僑政治向心和經濟支援的滿清官員、維新黨領袖、革命派首腦。實質上，他和新馬華僑群體一起，就在這段時期前後周旋於維新黨、滿清政權、革命派三者之間。

一，林文慶支持康有為的維新保皇運動³⁹

由於對中國的關懷，林文慶提出一些改革中國的見解，強調改革教育必須重視古代經典，同時迎接歐洲的科學和文化。他認為中國必須自救，著重於科學和教育，並向日本學習。他又主張聯英遠俄，在英國的協助下從事政治、教育、財政、商業、軍事的革新。他在結識新加坡改良主義者邱寂園(1896年)之前，在百日維新運動(1898年)之前，就已提出改革中國的見解。

從戊戌的變法到政變，從康有為避難新加坡到自立軍起事，林文慶成為一個積極的海外維新志士，加入邱寂園的《天南新報》，任英文總校。於1898年至1901年之間，他在《海峽華人雜誌》發表《中國的革新》。百日維新期間，新加坡代總領事劉毓霖奉命推展新式教育，林文慶答應負責策劃和籌款，與邱寂園配合。

林文慶要求殖民地總督保護避難新加坡的康有為。而康有為亦曾住進林文慶家。他與邱寂園幕後領導保皇運動和自立軍起義，及分別創辦《天南新報》和《日新報》，繼續鼓吹維新。義和團亂熾熱時，邱、林負責為保皇黨向粵僑商募捐。林文慶也受中國維新派領袖的器重。例如，梁啟超曾希望林文慶擔任東京高等大學學校董事，培養中國內地志士；及在香港辦西報，爭取白人支持皇帝。康有為則曾邀請林文慶譯改梁啟超的《戊戌政變記》，邀請林文慶為他執筆請求列強在八國聯軍進占北京後，協助皇帝。

二，林文慶為滿清政府效勞⁴⁰

甲午戰爭後至辛亥革命爆發，林文慶與滿清政權也有聯繫。他經常迎送到訪新加坡的清朝重要官員。1896年4月李鴻章抵新，總督麥傑爾在總督府設宴招待李鴻章，林文慶都躬逢盛會。1901年7月醇親王來訪，在同濟醫院接見紳商，席中林文慶和阮添籌奉獻頌詞，表白雖身在海外，卻不忘祖宗父母之邦，也祈望朝廷不忘海外華民。自立軍起事失敗後，林文慶和邱寂園遂疏遠康有為，並向朝廷表示"悔悟"。

1903年，林文慶應內務大臣肅親王的邀請前往北京。而肅親王曾遣送兒子到新加坡領事館學習英文，由林文慶督導。回新後發表文章，指出中國蘊藏豐富的資源和財富，鼓勵海峽華人把握發展的機會，分享屬於漢族子孫共有的遺產。1907年，清廷派遣慰問南洋華僑大臣楊士琦到新加坡。林文慶陪同楊士琦訪問檳榔嶼、馬來聯邦和爪哇等地，作為他的顧問和代言人。辛亥革命前夕，林文慶又代表新加坡出席在上海舉行的世界性華人商務總會的會議。1911年，奉肅親王旨諭，林文慶出任清廷政府內務部醫務顧問和北京西醫院監督。同年，又以代表身份出席巴黎、羅馬召開的國際醫學會議。

三，林文慶參與孫中山的革命事業⁴¹

1900年自立軍失敗和義和團事變使海外知識分子對維新黨和滿清政府大失所望，許多人紛紛轉向革命。林文慶的好友邱寂園跟康有為決裂，邱寂園的追隨者張永福和陳楚南都投入革命。林文慶的岳父黃乃裳自1904年離開詩巫后就跟革命黨人密切來往。林文慶本身深受英國溫和漸進的革新思想的影響，欣賞日本維新，贊同中國改革，反暴力行事是他一貫的立場。然而，隨著政治氣候的轉變，他也不得不有所調適。

林文慶於1900年搭救孫中山和他的日本朋友宮崎寅藏，是首次接觸革命派。當時他也是在最靠近維新派的康有為。1906年孫中山逗留新加坡兩個星期，組織了同盟分會。期間，孫中山與林文慶兩人連續三晚閉門長談。林文慶終於被說服放棄君主立憲思想，贊成建立中華民國，答應加入同盟會。1911年革命爆發時，林文慶從歐洲乘船趕到中國，與孫中山、黎元洪和黃興集合於漢口。根據林文慶自述，他們一夥人密聚在郊區的營帳裡，共商大事。

孫中山被選為臨時大總統，林文慶和他同船前往南京，參加在明室皇陵前的大典。其後，他在總統手下工作，擔任機要秘書、軍醫官、衛生部總監督之職。1912年年終，袁世凱玩弄政權，林文慶於是辭去所兼各職，回返新加坡。林文慶返新正趕上新加坡國民黨的誕生，隨著1912年8月中國同盟會改組為國民黨，新加坡的同盟會也於12月轉成合法的國民黨。

根據學者楊進發的研究，從1912年12月到1914年8月，國民黨在新加坡活躍一時，擁有會員兩千名，控制了南洋華僑總商會和南洋學務總會；它支持孫中山在中國的活動，跟傾向保皇和維新的新加坡中華總商會及其成員組織的共和黨(1913年)和進步黨(1914年)對立。

林文慶身份特殊，他受到孫中山和同盟會領袖的重視，又是新加坡中華總商會的創辦人(1906年)和領導人之一，於是汪精衛和孫中山曾先後於1912年和1913年請他和林義順負責促成新加坡中華總商會和南洋華僑總商會的合併。國民黨在新加坡受中英的壓力而在1914年被解散前，林文慶正是新加坡國民黨的重要領導人。

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林文慶第四度出任海峽殖民地立法議員，致力於領導當地人民支持英國作戰。當時，他也非常關心中國參戰之事，於是寫了一封致中國黎元洪的公開信(中國為何必須向德國宣戰?)，從儒家的思想、中國的歷史、中華民國的理想說明中國應該參戰。信中還說中國不能孤立於民主世界之外，不僅要切斷與德國的外交，還要向對方宣戰：中國可以在人力、物力和財力給予協約國幫助，加速德國的失敗；參戰後可以從經濟和外交上獲得許多利益，而更重要是此乃為正義、為民主、為儒家精神所作的抉擇。⁴²這也可說是他作為華僑一番苦口婆心而由衷的說話。

小結

林文慶的一生多姿多采，集中西文化，儒家，科學家，教育家，商人，政客於一身，卻獨鍾情於儒學。他在廈門大學執校政時，不惜與魯迅反目，卻堅持傳統儒學對學生培育的重要性。他對中國政治方面的立場，由支持維新、保皇，替清廷服務，以至最後參與孫中山的革命運動，變化可不少。這種表現也正是新加坡華僑整體的主流傾向。

華僑在新、馬地區生活，本是為了尋找生存的機會，進而掙取發展的方法和文化的出路。華僑在當地有穩妥的經濟基礎後，不忘中華文化的根源，不願放棄移居外地前的傳統。由於新、馬原居民的政治特權，華僑渴望祖國給予保護，故此極端關注中國的政治和尋找參與的機會。作為華僑，他們最後能做到的是利用當地資源，與當地人通婚，接受統治者的文化；與祖國維持聯繫及為祖國服務。面對清朝無力，西方強勢。林文慶作了他的選擇，亦留下了輝煌的一頁。

附錄一：林文慶年表⁴³

林文慶(字夢琴 Lim Boon Keng, 1869-1957)，祖籍福建海澄，
1869年，在檳榔嶼（Penang Island）出生，幼年隨父母移居新加坡。
1879年，喪母，
1885年，喪父。依祖父居住。曾在福建會館讀過四書，五經。後進入萊佛士書院（Raffles Institution）。
1887年，獲英國女皇獎學金，到愛丁堡大學醫學院。住宿於虔誠基督徒之家，受基督教義影響。
1892年，獲醫學士，並外科碩士。
1893年，回新加坡執業。協助創設英皇愛德華七世醫學院，任義務講師。
1895年，成為新加坡海峽殖民地定例局成員。
1896年，黃瑞瓊在長老教會結婚，育有四個兒子：可勝、可明、可能和可卿。
1896年，與陳齊賢試植樹膠，為華僑始創。
1897年，與律師宋旺相創華人好學會（The Philomatic society），創海峽華人雜誌。
1898年，提倡剪辮子。
1899年，與丘菽園、宋旺相合資建立新加坡女子學校。
1900年，嘗營救革命志士宮崎寅藏
1906年，孫中山到新加坡組織同盟會分會，林文慶欣然加盟為會員。與陳嘉庚成為孫在南洋主要籌款來源。
1908年，與殷碧霞結婚，育有兒子炳漢，女兒月卿。另一個兒子炳添。
1911年，在歐洲旅行考察，研究其政治體制。
1912年，出任南京中華民國臨時政府內政部衛生司長、總統孫中山的機要秘書兼醫官。北京外交部顧問。
1918年，獲頒英帝國官佐勳章。同年獲香港大學頒授名譽法學博士學位。
1919年，與黃仲涵等組華僑銀行，為華資大企業。
1920年，與林義順合資成立華僑保險（Overseas Assurance Corporation）
1921年，任陳嘉庚出資建立的廈門大學第二任校長。
1924年，發表“尊孔”演說，崇揚至聖先師的教育原則。

1926年，兼任廈門大學國學研究院院長。魯迅意見不合，受聘四個月後拂袖而去。
1929年，完成離騷的英譯。
1934年，陳嘉庚宣告破產，廈門大學瀕臨關閉。林文慶籌維經費，勉度難關。
1937年，廈門大學改為國立；返回新加坡。1937年，創立華僑籌賑祖國難民委員會。
1942年，被迫作華僑協會會長。
1957年，逝世。

附錄二：林文慶與基督徒的密切關係

1896年，林文慶迎娶了中國學者黃乃裳的女兒黃瑞瓊女士。⁴⁴ 這父女二人影響林文慶對中國語言和文化的瞭解。但這二人都是虔誠的基督徒。林文慶中學時代的恩師胡烈特校長以及留英期間的幾位關愛他的教授都是基督徒。他的中學同學兼好友宋旺相不僅是虔誠的教徒，而且長期領導新馬華人基督教協會，在新馬基督教發展史上佔有重要地位。而林文慶的第二任妻子殷碧霞女士也是基督徒。儘管林本人受洗的時間尚存疑問，林文慶與基督徒是有密切關係的。⁴⁵

但可以肯定的是，他對基督教有較深入的瞭解，而他關於儒家思想的很多論述都是以基督教作為參照來展開討論。甚至為此掀起了新馬地區一場長達15年（1895—1910）的儒教與基督教的論爭。⁴⁶

- ¹ 崔貴強著 新加坡華人: 從開埠到建國, 新加坡: 新加坡宗鄉會聯合總會, 1994, 頁9-20。
- ² 哈·弗·皮爾遜 (Harold Frank Pearson), 新加坡通俗史, 香港: 商務印書館, 1979 P. 121-122。
- ³ 崔貴強著 新加坡華人: 從開埠到建國, 新加坡: 新加坡宗鄉會聯合總會, 1994, 頁35-43。林遠輝, 張應龍著, 新加坡馬來西亞華僑史, 廣州: 廣東高等教育, 1991, 頁237-239。林孝勝, 新加坡華社與華商, 新加坡: 新加坡亞洲研究學會, 1999, 頁14-17。
- ⁴ “萊佛士登陸新加坡約半年後, 1819年6月25日, 萊佛士要法夸爾在公安與司法方面, “凡是華人, 武吉斯人及其他外國居民, 受到閣下所委任的各族首領直接監督。此等首領, 對於所管轄區域內的公安問題將直接向閣下負責。” 此項訓令似馬上付諸實行。根據文獻所載, 當局於1822年5月1日授權“華人甲必丹”負責監督賭攤。這位領導佔當時新加坡人口100分之25 (凡1159人) 的華人的甲必丹Tan Kow Sing, 中文姓名為陳浩盛。 “引自莊欽永, 新加坡華人史論叢, 新加坡: 南洋學會, 1986 P. 16。
- ⁵ 林孝勝, 新加坡華社與華商, 新加坡: 新加坡亞洲研究學會, 1999, 頁28-30。林遠輝, 張應龍著, 新加坡馬來西亞華僑史, 廣州: 廣東高等教育, 1991, P. 243。
- ⁶ 林遠輝, 張應龍著, 新加坡馬來西亞華僑史, 廣州: 廣東高等教育, 1991, P. 244。
- ⁷ Lee Poh Ping, ‘Chinese Society in Nineteenth Century Singapore’, Kuala Lumpur, 1978, P. 48。引自林遠輝, 張應龍著, 新加坡馬來西亞華僑史, 廣州: 廣東高等教育, 1991, P. 245。
- ⁸ T. P. Wang, ‘Chinese Towkay and Worker Strikes in the Straits Settlements (1857-1900) 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Singapore’, Nanyang Quarterly, Vol. XI, 1981, P. 9。引自林遠輝, 張應龍著, 新加坡馬來西亞華僑史, 廣州: 廣東高等教育, 1991, P. 246。
- ⁹ 林孝勝, 新加坡華社與華商, 新加坡: 新加坡亞洲研究學會, 1999, 頁43-58。林遠輝, 張應龍著, 新加坡馬來西亞華僑史, 廣州: 廣東高等教育, 1991, P. 246-249。
- ¹⁰ Yen Ching Hwang, ‘The Overseas Chinese and the 1911 revolution’, P. 30. Note 81。
- ¹¹ 1890年華民護衛司年報告。 Pitt Kuan Wah, “Chinese Coolie Immigrants in Nineteenth Century Singapore”, Nanyang Quarterly, Vol. XIV. June 1984。引自林遠輝, 張應龍著, 新加坡馬來西亞華僑史, 廣州: 廣東高等教育, 1991, P. 250
- ¹² 林遠輝, 張應龍著, 新加坡馬來西亞華僑史, 廣州: 廣東高等教育, 1991, 頁。 251-262。
- ¹³ 崔貴強著 新加坡華人: 從開埠到建國, 新加坡: 新加坡宗鄉會聯合總會, 1994頁57-61。蔡佩蓉, 清季駐新加坡領事之探討, 1877-1911, 新加坡: 八方文化企業公司, 2002, 頁140-141。
- ¹⁴ “峇峇“為僑生的統稱, 也指男的僑生, 女的則稱為”娘惹“
- ¹⁵ 梁元生, Study of the "Hui-xian She": a Chinese literary group in late 19th-century Singapore, 新加坡: 新加坡國立大學中文系, 1987, 頁26-27。林遠輝, 張應龍著, 新加坡馬來西亞華僑史, 廣州: 廣東高等教育, 1991, P. 263-268。
- ¹⁶ 林遠輝, 張應龍著, 新加坡馬來西亞華僑史, 廣州: 廣東高等教育, 1991, P. 269-270。
- ¹⁷ “他們當中許多人被孫中山吸引住了, 孫中山是廣州一個由十八人組成的革命團體裡的幸存者, 這個團體被殘酷地消滅掉了。他戴上眼鏡化裝, 穿得像一個沿街叫賣的小販, 來到他們中間宣傳中國必須造反的道理。這裡他的追隨者在1911年12月經歷一個激動人心的時刻, 當時“半島和東方”輪船公司準備開往中國的輪船“德凡巴”號駛進新加坡, 孫博士就在這時上岸。中國革命處在全力進行之中, 而孫中山正踏上征途, 前往指導這個古老帝國的命運。”哈·弗·皮爾遜 (Harold Frank Pearson), 新加坡通俗史, 香港: 商務印書館, 1979 P. 122-123。
- ¹⁸ 林遠輝, 張應龍著, 新加坡馬來西亞華僑史, 廣州: 廣東高等教育, 1991, P. 271-273。
- ¹⁹ 蔡佩蓉, 清季駐新加坡領事之探討, 1877-1911, 新加坡: 八方文化企業公司, 2002 頁129-130。
- ²⁰ 蔡佩蓉, 清季駐新加坡領事之探討, 1877-1911, 新加坡: 八方文化企業公司, 2002 頁131。
- ²¹ 李金強著, “從祖國到南洋 -- 清季黃乃裳革命思想之源起 (1899-1904)” 刊於辛亥革命與二十世紀的中國。中卷, 中國史學會 編 中央文獻 2002年8月, P 2048-2074。詳盡論述有關黃乃裳與辛亥革命的關係。黃乃裳是林文慶的岳丈。
- ²² 黃乃裳: 《緩丞七十自序》, 陳立訓等編《詩巫福州懇場五十周年紀念刊》, 詩巫福州公會 1950 年刊本。引自林遠輝, 張應龍著, 新加坡馬來西亞華僑史, 廣州: 廣東高等教育, 1991, P. 274-275。

- ²³ 馮自由：《華僑革命開國史》，商務印書館1947年版，第73頁。引自林遠輝，張應龍著，新加坡馬來西亞華僑史，廣州：廣東高等教育，1991，P。275。
- ²⁴ 林遠輝，張應龍著，新加坡馬來西亞華僑史，廣州：廣東高等教育，1991，P。276。
- ²⁵ 蔡佩蓉，清季駐新加坡領事之探討，1877-1911，新加坡：八方文化企業公司，2002 頁131。
- ²⁶ 林遠輝，張應龍著，新加坡馬來西亞華僑史，廣州：廣東高等教育，1991，P。P。281-284。
- ²⁷ 崔貴強著 新加坡華人：從開埠到建國，新加坡：新加坡宗鄉會聯合總會，1994，頁182-184
- 蔡佩蓉，清季駐新加坡領事之探討，1877-1911，新加坡：八方文化企業公司，2002 頁131-134。
- ²⁸ 崔貴強著 新加坡華人：從開埠到建國，新加坡：新加坡宗鄉會聯合總會，1994，頁169-182。蔡佩蓉，清季駐新加坡領事之探討，1877-1911，新加坡：八方文化企業公司，2002 頁135-140。
- ²⁹ 林遠輝，張應龍著，新加坡馬來西亞華僑史，廣州：廣東高等教育，1991，P。285-286。
- ³⁰ 林遠輝，張應龍著，新加坡馬來西亞華僑史，廣州：廣東高等教育，1991，P。290-295。
- ³¹ 林遠輝，張應龍著，新加坡馬來西亞華僑史。
- ³² 程光裕，星馬華僑中之傑出人物，臺北：華岡出版有限公司，1977，頁55-84。
- ³³ 殖民當局開辦英文學校接受僑生入學，在1886年設立了女皇獎學金 (Queen's Scholarships)，選派一些僑生往英國讀大學。
- ³⁴ 李元瑾編著，東西穿梭，南北往返：林文慶的廈大情緣，南洋理工大學中華語言文化中心，2009，頁46-47。
- ³⁵ 陳育崧：《椰陽館文存》第二卷，第390-395頁；黃：《星馬華人志》，香港明鑒出版社1967年版，第113頁。引自林遠輝，張應龍著，新加坡馬來西亞華僑史，廣州：廣東高等教育，1991，P。268-269。
- ³⁶ 李元瑾編著，東西穿梭，南北往返：林文慶的廈大情緣，南洋理工大學中華語言文化中心，2009，頁48。
- ³⁷ (廣東的哀號)("A Voice Heard in Canton")就是哀悼百日維新失敗的英文詩歌，總共八段。詩中林文慶表達了對康有為的同情、對光緒皇帝的讚賞，以及對慈禧太后的不滿。
(光緒皇帝)("His Imperial Majesty Kwang-su")一文，讚揚皇帝是個真正的中國人，熱愛古典經書、追求新知識，信賴康有為、領導維新，縱使遭遇不幸也必英名永垂。
(辜鴻銘對慈禧的崇拜)("Mr. Ku Hung Ming's Apotheosis of Tsu-Hsi")，對他自己向來敬重的海峽華人精英辜鴻銘表示深切失望，痛批辜撰文肯定太后在1898年政變和1900年義和團事件中所作的貢獻，評之為極盡奉承與福媚之能事。
另外一篇(1898年的北京宮廷政變)("The Peking Coup D'etat of 1898")，描述甲午戰爭後知識分子的政治改革思想，並論述從百日維新到宮廷政變前後發生的事件
- ³⁸ 李元瑾編著，東西穿梭，南北往返：林文慶的廈大情緣，南洋理工大學中華語言文化中心，2009，頁64-68。
- ³⁹ 李元瑾編著，東西穿梭，南北往返：林文慶的廈大情緣，南洋理工大學中華語言文化中心，2009，頁210-219。
- ⁴⁰ 李元瑾編著，東西穿梭，南北往返：林文慶的廈大情緣，南洋理工大學中華語言文化中心，2009，頁210-219。
- ⁴¹ 李元瑾編著，東西穿梭，南北往返：林文慶的廈大情緣，南洋理工大學中華語言文化中心，2009，頁210-219。
- ⁴² 李元瑾編著，東西穿梭，南北往返：林文慶的廈大情緣，南洋理工大學中華語言文化中心，2009，頁210-219。
- ⁴³ 林文慶傳，上海：上海科學社，1970，頁1-73。
- ⁴⁴ 黃乃裳是舉人出身，曾參與康梁維新。其女黃瑞瓊精通中英文，在出嫁前便已遊歷歐美，對東西文化均有一定造詣。見Song (1905：151)
- ⁴⁵ 李元瑾曾對這個問題做過多方考證，詳見《林文慶的思想：中西文化的匯流與矛盾》。頁99-100。
- ⁴⁶ 張靜，從林文慶儒教認同的思想形成再探新馬儒教運動(1894-1911)的性質，台灣東南亞學刊，6卷2期，2009年，86頁。